

社会 心理 话 语

施旭 冯冰编译
〔荷〕冯·戴伊克著



话语 心理 社会

[荷]冯·戴伊克 著

施 旭 冯 冰 编译

责任编辑：张力伟

话语 心理 社会

〔荷〕冯·戴伊克 著

施旭 冯冰 编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桥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8 3/4 印张·187 千字

1993年 2 月第1版 1993 年 2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37.50元

ISBN 7-101-00930-1/H·77

译者前言

话语分析是语言学中发展最快的前沿领域之一,其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不断涌现出来。近年来,尤为令人注目的是话语分析与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本译文集将介绍该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冯·戴伊克(van Dijk)教授的最新工作。

冯·戴伊克1943年生于海牙附近村庄的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自由大学学习法国语言文学和理论诗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至今,现任该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他还是《诗学》的创办者,1971年至1979年为该期刊的主编;1980年后为《话语》杂志的主编;现为《话语与社会》杂志的主编。

冯·戴伊克是位建树颇丰的语言学家。起先,他运用语言学、语义学方法研究文学理论和话语语法。后来主要从事话语处理的心理分析。近年来,冯·戴伊克转入更高层次的跨学科研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理论,研究话语在社会环境中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和揭露一些急待解决的现代西方社会问题。我们选择了冯·戴伊克教授1980年以来发表的一些论文,目的不仅是将它们介绍给国内的语言学界,而且更希望介绍给对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们。

为集中反映冯·戴伊克教授的最新成果,同时又考虑到读者的需要,我们对论文选择的原则是介绍性文章与专题性文章相结合(见目录)。

熟悉冯·戴伊克教授的工作的读者,仅从目录上就会发现,他

在研究方向上有了变化。但是，这一段的工作与前期的研究是有联系的：它包含了对以前理论的更新和扩展。因而我们要对冯·戴伊克的整个研究工作和重要学术思想做一简约概述，相信这对理解书中内容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冯·戴伊克的工作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1)话语语法(1972—1977)，(2)话语处理(1978—1983)，(3)社会话语(1984—)。

• 1 •

西方现代语言学兴起后，语言学家长期把句子作为最大的语言单位进行分析，而对大于句子的结构避而不谈，将解释不了的话语的无穷选择和变化现象、句子前后连贯现象等都塞给文体学家。到了七十年代早期，一些学科意识到对语言的这一偏见，开始注意话语行为、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实际的篇章和会话，总之更加注重对自然话语现象的研究。而在语言学界，冯·戴伊克以其划时代的博士论文《话语语法要略》(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 1972)以及该时期的另一部代表作《话语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 1977)，推出话语语法理论。冯·戴伊克提出句子语法不能满意回答的问题，阐述话语句子的局部和整体连贯等一系列语义关系，建立话语语法理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诗歌作品。这些话语虽然不遵守语法、语义的常规，但是都属于某一语言系统的语篇，所以它们在语音、句法、意义组织平面上必定有一套“文学操作原则”。在生成转换语法的影响下，冯·戴伊克试图建立“生成诗学”的语法，即通过一些规则生成文学作品的结构。冯·戴伊克的话语语法的重要特点就是它包括对话语内容的形式表现，即“宏观结构”。宏观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个复杂的命题，它通过一些规则从话语句子表达的命题集合(“微观结构”)中衍生出来。因此

它是话语的底层语义表现(内容或概要),在具体句子意义的基础上定义话语的局部和总体语义连贯。冯·戴伊克提出这一语法模式的道理很简单:话语生成必须先有一个主题或话题,然后话题演化成具体的意义,这些意义再发展成实际的句子。反之,话语生成后,人们总要经由些程序(如删除、概括和构建命题)将话语的话题或主题重新整理出来。

• 2 •

然而,冯·戴伊克认识到,要全面阐述话语的语义和解释,讨论诸如连贯、宏观结构之类的概念,就必须牵涉到认知因素。于是,在心理学、人工智能开始研究话语认知处理的同时,他转向话语处理的认知心理研究,与美国心理学家金什(Kintsch)共同创建了话语认知处理的跨学科理论。这一段时期的主要著作是:《宏观结构》(Macro Structures, 1980)、《话语理解策略》(与金什合著,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1983)。这一话语理解模式是话语表现的更普遍理论,它适用于一切话语。该理论假设,语言使用者处理输入话语时,其关键过程是构建话语的语义表现——语篇库。其形式是由重叠话题等各种因素连结的、局部和整体连贯的命题序列。换言之,话语处理者构建话语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表现。这似乎与第一阶段的话语语义表现相像,但是此时的理论强调,理解过程是策略的(而非结构的和规则管辖的)。这有若干含义。首先,信息构建过程产生于短时记忆,但是由于短时记忆能力有限,该过程必须是循环的。即子句先解释为命题,命题再连贯起来并逐渐存入情节记忆,然后新的子句才能被解释,如此不断重复,而每一循环又包含了删除、选择和构建命题的过程。更重要的,话语理解不仅仅是构建话语的宏观结构,它还牵涉到以前关于真实世界事件和情景的各种模型知识。具体地说,局部和

总体解释本身还需要各种预设知识,如记忆中的情景和语境信息。同时,理解的各个过程还受到控制系统(包括话题、听者/读者的目标、知识程式和信念等)的监控。这种更加灵活的策略理论使实验者得以观察自然状态下的阅读活动,并已获得大量实验依据(比如,从结构分析得到的内容等级对应于人们回想活动情况:对高层次信息的回想多于低层次信息)。这些对许多领域,如语言教学、思维行为、社会话语的研究,有可观的实用价值。

. 3 .

经过话语语法、话语理解的多年研究,冯·戴伊克建立了坚实的话语分析理论;于是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时机成熟了:近年来,他对西方的社会话语、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进行了交叉学科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著作有《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 1984),《种族歧视的交流》(Communicating Racism, 1987),《新闻话语》(News as Discourse, 1987)等。冯·戴伊克把前期的关于话语理解的认知学说,扩展或提高到话语的社会心理层次。这里,他强调社会认知(如态度、观念、意识形态)起连接社会结构和社会话语的纽带作用。冯·戴伊克把西方的社会结构抽象为以社会群体为单位的,相互对应的权势(power)结构,如社会名流与百姓、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男人与妇女、白人与黑人,如此等等。冯·戴伊克认为篇章话语在表达权势关系,以及行使权势上起关键作用(当然其他还有诉诸武力的行为)。话语本身就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行动,它具有说服和感召力。另外,话语的使用范围也有控制力:权势者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话语,而无权势者至多能控制日常会话。但是,尽管社会权势往往靠社会话语来表达和实现,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这一过程要通过社会认知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情景和交际模型的媒介作用。另言之,权势依靠知识、信念、意识而存

在和再生，而话语表达和交流权势存在和再生的条件是社会认知。因此没有社会认知再现和模型知识，我们便无法产生和理解社会话语。冯·戴伊克特别调查分析了大众传播和种族歧视的话语材料，说明西方社会名流如何通过控制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达到控制社会信念和意识的目的。

我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工作有过多年停顿，而现代语言学研究也刚刚起步，愿这些学科的学者们联合起来，开创国内的社会—心理—话语的交叉研究工作，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译本序

本书所选的十篇论文是我在八十年代完成的。在这篇序言里,我将从更广的角度论述文章中的新观点。但是,我必须首先表达对译者施旭先生最深沉的感谢和钦佩。施旭先生近年来一直从事话语分析工作,并着重研究了我的著作。毫无疑问,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透彻地了解我的思想。这种知识使他成为一位独特的译者:他不仅翻译语言,而且真正懂得其内容、目的和背景。同时,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年轻学者冯冰,她参加了部分翻译和修改工作。如果这些论文对中国话语学者有益的话,那还应该归功于这两位优秀的学者和译者。

话语分析

本书所选论文的写作背景是发展中的“话语分析”或“话语科学”。这一交叉科学既新近又古老。一方面,就其目前的形式,话语分析只是二十来年前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世界一些古老文化中的语言使用和修辞研究传统应该被看作是话语科学的历史背景。例如,在欧洲、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这种传统受到希腊、阿拉伯、罗马修辞论著的启发,并且对于当今的研究仍有影响。

作为人文科学重要门类之一的古典修辞学衰落之后,一门新学科在本世纪诞生:结构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是现代话语分析的来源之一。尽管这些语法主要讨论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对语言形式系统的精确描写,为系

统分析语篇结构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六十年代末,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语言学者提出建立“语篇语法”,以跨出句子框框,进而明确描写语篇结构,因为语篇语法更容易解释那些表达句子间底层语义连贯的语法现象,如代词、指示词、连词、副词等。

话语分析的发展平行于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并未囿于话语语法结构的描写。结构诗学和现代修辞学促进了对叙事、争辩和文体结构的话语研究。另外,新兴的社会语言学把文体定义为受语境制约的、语言使用的变异形式,对其进行分析。同时,语用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研究,证明话语不仅是言语结构,需要音位学、词法学、句法学和语言学的分析,也不仅是特殊的修辞、文体、叙事结构;它还是行动的形式。微观社会学从另一个角度对说/听话者的言语行为作了分析,但是更加重视自然话语的常规性和交往性(比如表现在日常会话和机构对话的策略步骤和接话过程中)。

除此之外,起初深受生成语法影响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也开始探索句子以外的语言理解问题,广泛研究语篇理解和记忆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说,六十年代中期,话语分析受到语言学和诗学的启发;七十年代初,话语分析从狭隘的“结构主义”模式,发展成一个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容纳了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新思想。近十年来,话语分析的不同方面不断结合,而且,如同其他新学科一样,在这一学科里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研究:如(不同学科中的)连贯现象、法庭交往、故事叙述、话语理解的计算机模拟、报界新闻报导等等。

在许多方面,我的工作与该领域中其他人的工作平行发展。在结构诗学和语篇语法的研究之后,我很快意识到,要更好地解释话语特征,如连贯概念、宏观结构等,必须运用认知心理学。意义、解释、及话语中命题的局部和总体连贯,不仅是语法和语言现象,

而且也是(如果不是主要的)认知现象:它们应该描写成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再现和过程。对于这些,我已做了详尽的分析(大部分与美国科罗拉多州波德大学的心理学家Walter Kintsch合作)。

政治、社会功能和语境

不久之后,我与其他话语分析学者认识到,篇章、谈话的“形式”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话语分析不应该只注意语法、叙事、修辞、文体或其他结构,也不应该只实验研究话语结构在记忆中生成和理解。它还必须分析话语的社会、文化、政治功能(即语境)。

这一新要求的提出有多种原因。首先,人们总是在不断探索,他们要突破目前的范围以获得新知识。研究句子结构的句法学以及后来的语义学越过了传统语言学中词的界线;同样,语篇语法越过了句子界线;语用学和会话分析在形式和意义的基础上,又引入了行动和交往概念,以此作为语言使用的重要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影响深远的认知研究也同样如此:近来,它融合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哲学、逻辑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成果,形成了“认知科学”。

第二个原因在于,除社会语言学和民俗学之外,所有这些新理论都起码有一个明显缺点:忽视语言使用和话语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都很自然地忘记,篇章、谈话不仅是传达个人之间意思的工具,它们主要还是**社会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不仅表现在“认知”的个人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文化、政治群体或机构成员之间。当然这并不是新观点:在会话(由不同地区、性别、社会阶层等引起的)语言变异、话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微观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民俗学已经论述了这一观点。但是,它们多数集中于语言使用和话语本身:社会、文化语境的讨论往往是因为它们对语

法、话语结构有特殊影响。然而,相反的关系,即话语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话语对日常微观情景的作用,却很少有人明确地阐述。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正是受这种环境的启发而完成的。让我简约地阐述这些文章的思想背景和研究基础。

话语与社会认知

话语认知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对“社会认知”在篇章、谈话中作用的研究。所谓社会认知,是指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人们,在把对方作为某社会范畴或群体进行交往时,所经历的思维再现和过程。传统社会心理学对一些社会认知(比如态度)做了大量研究。尽管早期的工作已具有一定的认知性,但是对态度的研究多数采取狭隘的行为主义观点。由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获成功,社会心理学也日趋认知化。于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如个人认识、劝说与态度变化、群体认识和交往、交际等等,很快采纳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语言,诸如“程式”、“间架”以及其他“格局”。

在这一框架里,话语分析也起着重要作用。其实,社会心理学中许多传统和现代概念与话语交际有关:比如社会化、劝说、交往、印象形成、自我表现、归咎;更一般地说,它们与人们相互之间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变化有关。可是直到最近,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忽视了社会认知的言语因素。即使是涉及到话语时,社会心理学也只是在有限的劝说试验中把话语作为理论上很肤浅的“信息变量”来处理。人们自然而然地忘记,社会认知往往是在话语交际过程中获得和使用的。我在八十年代(希望同样在九十年代)的研究目标之一,是全面探索这一假想的涵义。

这项研究的复杂性是很大的。它首先要求对社会认知,如社

会成员相互间的以及对社会事件、关系、结构的态度和类似的观点系统,从理论上做严肃、明晰的结构再现。这一点我们尚未做到。虽然对态度的性质、功能的研究已有五十年历史,严格地说,我们对态度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的具体内容、组织和策略使用,知晓甚少。换言之,我们的社会记忆“图”并非完整。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常用到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是同样情况。群体及其成员的社会、文化、政治观点和态度显然有某种整体性或连贯性;我们可以假设,意识形态及其底层的(群体)标准如价值观,在社会态度的形成和改变过程中具有中心组织作用。当然,目前我们还了解意识形态的精确结构,也不知道它“控制”具体态度形成的过程。每天,在传播媒介的作用下,我们都接触到总体“环境”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比如,它们影响着我们对核能源使用、工业废料处置、自然资源消耗的态度。这种意识形态如何逐渐从传播话语、教学资料、日常会话中产生,我们并不清楚;而意识形态一旦建立,又如何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产生新态度,我们也不知道。又如,男性关于女性的意识,城市市民关于乡村农夫的意识,第一、二(“西方”)世界的人们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意识,也同样如此。

这里我们要提出关于以社会认知方法研究话语(和话语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认知)的第三个原因。我们假设,意识形态、态度或类似的社会认知的内容、结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在话语的内容、结构和策略上;反之亦然。但是,这里不存在严格的平行关系。许多“扭曲”、“转换”现象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如交往的社会性)加以解释。比如,一位男性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抱有传统态度,但是由于害怕被看作老朽(如果不是大男子主义者的话),他可能会根据现时语境或听者情况,调整自己的话语。另言之,底层社会认知和篇章、谈话的关系并非直接,它受到其他交际、社会、文化目标和利益的监控,受到语言使用制约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社

会、文化、政治结构与认知再现、话语表达和交际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要求我们在九十年代加以重视。这种研究不仅将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认知，社会交往的底层再现和策略，而且也将使我们深入了解许多话语结构，如意识形态的、文化的话语结构。这些在结构分析和认知研究中都被忽视了。

种族主义的再生

虽然关于话语和社会认知相互关系的一般性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具有理论必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具体的方面，从实证的、解决问题的角度探索这种关系，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八十年代里我的大部分研究有关西方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偏见、歧视和种族主义行径。偏见、成见是社会群体认知的一种形式。尽管社会心理学常论及偏见、成见，但是它们需要用更系统、明晰的社会认知和话语理论来分析。而且偏见往往是从各种话语形式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包括报界新闻报导、教科书、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成员之间的日常谈话等。同时，对少数种族群体的许多歧视、种族主义形式是靠语言传播的。因此，各种理论、社会、政治原因说明，对偏见、歧视和种族主义作话语分析是必要和及时的。

本书中有几篇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的确发现了上文提出的假设的依据：在篇章、谈话的内容、结构、策略和西方白人对第三世界人民、西方国家内少数民族的“种族”群体再现的内容、结构和策略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值得注意，由于尊重社会公认的礼貌、容忍准则的人不愿意被人称作种族主义者，许多带偏见的话语随情景的不同被巧妙地调整了：人们运用各种预防造成反面印象的策略；常见的有“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

是……”，“我对妇女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当然不是所有黑人都很懒惰，但是……”。在提出有关其他群体的反面意见之前，人们经常会使用这样的策略。

尽管这些研究主要是学术性的，但是，很显然，它们具有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若要严肃认真地研究种族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你不可避免地要对教科书、报纸、电影以及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的日常谈话，下一番结论，并指出话语使用的正确形式。偏见、歧视、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人观点或作法，从根本上说，它们与群体、权势和统治有关。它们再生统治形式并使之合法化。这样的统治形式包括权势者剥削、排斥、抵毁无权势者或少数民族群体。分析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统治过程，是为了解其内在机制；了解其内在机制，是为创造批评和抵抗统治的工具。这不仅适用于种族关系，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压迫形式。

据此，话语分析的方向之一便是引进文化、社会、政治因素。如果对篇章、谈话的广阔环境没有详尽的知识，我们便不可能完全懂得社会认知形成（因此日常话语产生和理解）的重要控制因素。许多话语结构，如上述的否认说法（“我不是……，但是”），叙事结构、争辩手法、文体选择（如“自由斗士”与“恐怖分子”）等等，都与话语内在的社会、文化、政治功能有关。最近我创办了《话语与社会》杂志，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批评话语的角度出发**，讨论这些社会、文化、政治问题。

未来的研究

通过对话语分析总体发展以及我个人的研究的简要介绍，我们看到该领域已出现了可喜的成果。话语分析的许多“传统”研究项目，如语篇语法问题、会话的具体策略，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这

无疑是它的任务。但是后来所扩展的领域：文学研究、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对一些涉及话语现象的学科，如大众传播、法学、政治学、史学，我们尚需进一步探索它们对话语分析的实际意义。我八十年代对新闻报导的研究，显示了如何将话语分析运用于传播媒介这一重要话语体裁的研究。然而，我和该领域的其他同事只是在多学科的传播媒介话语分析方面开了一个头。社会话语还有许多其他形式，它们也需要仔细分析。这是九十年代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自己仍将继续上述工作，即对社会认知与话语关系的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际、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都是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比如，我前期对话语再生种族主义的研究表明，社会名流精英在偏见再生过程中起着显著作用——尽管他们一再正面描绘自己，表现出各种“容忍”态度。这些人统治国家、掌管法庭、教育学生、进行科研、撰写教科书和新闻、领导商业公司。因此，最终是这批人在报纸上传播偏见故事，在教科书中片面描写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在各机构和公司里的雇佣业务中歧视少数种族成员。精英名流们的微妙、具体的种族主义话语尚需做更深入的调查。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构建关于社会认知在语言和话语使用中作用的一般理论。上面已提到，我们还要更多地了解社会认知（如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策略，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话语结构和策略的。这样，更多宏观的社会、政治因素就必然要被引入这一复杂的框架里。社会结构，如阶级、性别、种族、机构、等级关系等，与篇章、谈话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我们要经过几个认知、微观宏观社会（交往）步骤，才能将话语的微观层面与总体、宏观的社会、文化、政治结构联系起来。为精确解释人们如何通过话语行使权势，而其他人士又是如何通过对抗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来抵制权势。

的,我们必须弄清这些步骤。

一旦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些过程的内在机制,话语分析就大有可为。然而,这里的复杂情况又是难以估量的。不要以为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便可以获得这种认识了。而且我们要懂得,这种认识不可在单一的学科中获得。上面涉及的问题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共同努力解决。研究方法问题亦是如此:我们要利用形式语法、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的试验、实地定性调查。在改进方法问题上,话语分析将起重要作用:因为它所提供的描写范畴和手段,正是传统社会科学在处理话语“数据”时所缺乏的。

最后,这些研究还应该是国际化的,正像国际政治、文化、商业贸易。我对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工作,使得个人生活都受到群体忌愤、歧视和偏见的严重干扰。其实,无论在世界何方,创造和平、繁荣与消灭压迫、贫穷密切相关。然而,解决这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条件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之中:它们受到人们相互之间社会认知的监控。而话语对社会认知的形成与变化有辅助之功效。

所以,话语分析只有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进行,并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向,社会、文化、政治传统和背景进行发展,才能成为成熟、有益的科学。我认为,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应该达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新高度:一方面它必须具备完善的理论、描写和使用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它必须有同样高的应用标准:对研究成果进行批判地应用,将其社会、文化、政治涵义用于解决世界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呼 吁

最后,为促进话语分析的国际化,我恳请读者对这些论文提出